

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研究

□张骋原¹

(1.星海音乐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伟大的作曲家, 钢琴家, 音乐教育家——冼星海, 这个响亮的名字深深烙印于中国人民, 乃至世界人民的心目中, 在被誉为“人民的音乐家”。从音乐教育角度对冼星海的一生的成就进行分析与学习, 跟随其音乐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 以及从多元视角对其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深度剖析, 为新时代音乐教育发展构建厚重的历史积淀, 同时也是充分发挥榜样力量, 为党、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凝结先人智慧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

[关键词]冼星海; 音乐教育; 教育思想

Research on Xian Xinghai's Music Education Thought

□ZHANG Chengyuan¹

(1.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 As a great composer, pianist and music educa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Xian Xinghai, this resounding name is deeply engraved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ven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e is hailed as "the musician of th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achievements of Xian Xinghai throughout his life, follows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his music education thoughts, and conducts a deep analysis of his music education though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is is to build a profou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to fully exert the power of role models. It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goal for condensing the wisdom of our ances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education cause.

作者简介:张骋原, 男, 广东省广州市星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Key words] Xian Xinghai; Mus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

冼星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杰出的一批音乐家，其不仅推动了中国本土音乐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其音乐教育思想也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以及革命性思想的培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是进一步促进中国当今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为其注入鲜活生命力以及时代力量的重要方针。本文从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特点出发，以《冼星海全集》为基础，深度挖掘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特点背后的育人价值，从其音乐教育思想的民族性特点，爱国主义音乐教育思想以及其创新且富有科学性的教学活动三个角度分析，并总结其对于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的民族根脉

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其民族性特点体现在对民间音乐的吸收与转化之中。他提出中国需要“普遍的音乐”思想，主张音乐应服务于人民，强调创作要贴近民众生活，反映民族精神。在教学实践中，他注重引导学生从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因为他认为民族性的音乐是最能渗透到本民族人民的心中，充分发挥音乐感染力的。这种以民族性为根基的音乐教育理念，不仅加深了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基底，也为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先进思想力量。

（一）民族性教育意识初见端倪

冼星海的以民族为本的音乐教育思想的萌芽，即其民族化音乐思想的形成的主要来源，主要源于其出国留学期间。冼星海在法留学的5年（1930年——1935年）间，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正处于存亡危难之际，但正是在这艰苦卓绝的学习环境中，冼星海得到了历练与成长，其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

在文章《我学习音乐的经历》中，冼星海着重描写了在法国巴黎学习生活的艰辛以及其刻苦学习，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一段经历，为冼星海音乐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及其用音乐服务中国的理想的形成埋下伏笔。他在巴黎半工半读，勉强生活下去，作为学生，也作为一名工人。在“国际工会”中了解到中国已经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困境之中，于是便萌生了跳脱出“学院派”作曲技巧的内容限制，即“艺术至上”的思想的限制，仅仅将音乐作为表达情感的工具，用于表达其对于自身悲惨命运与被压迫的中国命运的感慨。最值得注意的是，便是他的作品《风》在巴黎上演并获得赞誉。这也使他最初认识到，民族音乐元素的影响力与感染力。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己，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1]”“在巴黎的作品，连作《风》也未确定，只不过是印象派的作风和带上中国的风味罢了。而尤其觉得高兴的，是我的作品那时已找到了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

冼星海将在国外的经历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相联系，将国家的苦难、人民的苦难牢记心间，并将其感慨转化为音乐作品，这就是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中民族性思想觉醒的重要体现。

（二）“民族形式”的音乐教育倡导

冼星海在文章中《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中多次提到“民族形式”的音乐。冼星海的音乐作品是其开展音乐教学以及社会教学的重要资源，充分理解冼星海所提到的“民族形式”的音乐，是理解冼星海对于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设想的重要落脚点，也是研究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的必经之路，以及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运用于当今音乐教育的起点。所谓民族形式，是在创作中融合了我国民族音乐元素，运用西方作曲技法来进行音乐创作的音乐形式，同时保证“以内容决定形式，拿现代进步的音乐眼光来产生新的内容，使音乐的内容能反映现

实，反映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2]”

冼星海的教育情怀深深地扎根于时代。他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音乐，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西洋音乐或最为传统的民族音乐，他提出了中国需要“普遍的音乐”，“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3]”他认为要让中国的音乐有所发展，就要避免进行精英化的教育，对于中国当时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而言，不需要培养“贝多芬”，而是要让中国出现“贝多芬”这个事情成为可能，即尽可能地提高中国整体的音乐素养。这也是其构成其音乐教育思想的主梁。

冼星海在实践中发现了民族形式的音乐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其在《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中系统地讨论了“民族形式”的音乐的重要性：“要解放民族，要加强抗战的决心和要争取最后的胜利。^[4]”音乐的创作与表达以及音乐创作形式的选择，对于作曲家来说，是随着个人见闻、创作环境以及社会大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在当时，中国的抗战转移到了农村，抱着爱国主义情感的军队，学生，革命先进分子都深入到了农村生活之中，音乐形式与内容的转变是必然结果；“提高民族自尊心，尤其是要洗刷过去帝国主义一向看不起中国的耻辱，同时必须消除我们一向不相信自己的习气。”中国的国情一直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着中国的劳苦百姓。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发展迟缓的环境下，作为音乐工作者，就要担当起文化建设的重任，创作出中国百姓需要，时代需要，同时也是世界所需要的民族之声。

对于从事音乐教育的教师，冼星海认为除了要提升自身音乐教学能力与专业能力外，在教学活动中更要充分理解学生所需，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与保障。“要达到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而民族形式是老百姓和群众生活思想的反映，我们必须把握民族形式，才能有所贡献，有所建设。”想要提高音乐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来创作，用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元素进行创作，才是对老百姓最有启发与感染力的。

（三）以中国民歌为根基的音乐教学

冼星海重视民族性音乐的教学理念折射在他的音乐教育实践中，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对于学生的价值观传递这两个方面。在“鲁艺”任教（1938—1939）期间，相对安定的环境以及课程安排使他可以专心钻研音乐创作以及在学校开展教学活动。

冼星海在延安充分利用了鲁艺师生收集的中国本土的民歌素材以及来自苏联的世界音乐资料，撰写了大量的音乐相关论文用于教学，如《民歌研究》《民歌与新兴音乐》等。这两篇论文同时也作为其教学与演讲的讲稿，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重视中国传统民歌，并将与本民族相关的音乐内容运用于学生自己的音乐创作。《民歌研究》一文从多元化的角度深刻分析了民歌对于音乐创作的重要性，具体包括民歌的内涵、中国民歌创作历史分析、民歌的特性、民歌的研究方法与创作方法以及民歌研究对于中国新音乐前途的关系分析。

冼星海在文中写到：“新兴音乐有着它的伟大前途，我们要继续努力研究民歌，批判地接受外国进步的技巧和理论，从而创作新形式的新音乐……我们应与资产阶级对民歌不正确的理论作斗争。新音乐的方向是工农兵，因此，我们要从工农的劳动节奏中、旋律中发展新音乐，而民歌是从农民中产生出来的，它与新音乐的关系可想而知了。^[5]”从上可知，冼星海主动发掘民族音乐的价值，并运用于音乐教学中。同时他也希望他的学生，重视音乐创作中的民族性音乐元素的运用与表达，创作出贴合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为中国“新音乐”发展有贡献的音乐。

二、冼星海音乐教育思想的鲜红底色

作为一名爱国主义作曲家，教育家，演奏家，冼星海不仅具有过人的音乐技巧，优秀的教学能力，同时还具备过人的政治素养，以及将拯救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为己任的伟大抱负。也正因如此，1945年冼星海去世

后，毛主席亲笔题下“向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哀悼”的深刻悼念，这也确立了冼星海“人民的音乐家”的地位。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指导教师“在培养音乐人才时，我们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理论、学习党的思想，传播正义之道、弘扬正能量。^[6]”本章将以冼星海在各地展开的音乐教学活动为主线，从冼星海自撰及其相关文字资料中分析其思想形成过程，在不同环境与时期中政治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对音乐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一）战火中的抗日歌咏活动

冼星海积极参与抗战歌曲的创作以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主动扛起抗日救亡合唱活动的大旗，就是他最早，也是最直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1930年11月，冼星海回到中国，投身救亡歌曲的创作中。他最初是依赖于资本的力量，为私人唱片公司创作商业歌曲，创作爱国歌曲的同时也作为正当职业，可以勉强糊口。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如《战歌》、《救国进行曲》、《我们要抵抗》等优秀作品。斗争与抗战并不是冼星海个人的选择与愿望，是整个时代的心声，冼星海将时代的心声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并受到了欢迎。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混乱时代下，也更凸显出冼星海个人品质与精神的不凡与超脱。在《战歌》唱片与底片被打毁没收后，百代唱片公司迫于社会压力，不再购买冼星海的作品；新华影片公司也要求冼星海创作《新毛毛雨》之类的低俗商业作品。他在《我学习音乐的经历》中写到“我在此时接触了许多埋头苦干的人士，他们真心的为祖国的事业来献出全部力量，也看见了许多只顾出风头的人物，也看见表面热心实际压迫人的人物。”这些遭遇无不打击着冼星海的创作激情，但不会影响他的爱国热情，“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7]。

在“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冼星海便受邀前往武汉参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加入了演剧第二大队，参与合唱宣传与合唱教学工作，学生主要是工人与农民，也有些周边学校的师生。“武汉的歌咏队到处建立，一直扩大到工厂、商店、农村。又和张曙兄合作，开过许多歌咏大会，举行过歌咏大游行，游行时，商店一起合唱起来。^[8]”在这一时期，冼星海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如《保卫武汉》、《新中国》、《当兵歌》等作品，也让冼星海在实践中确定了，抗战歌曲的力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进一步增强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运用于合唱教学中。

（二）“以乐为枪”的革命抱负

音乐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在冼星海的教育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鲁艺”两年的教学生活中，成长的不仅是学校里冼星海的学生，同时也包括了作为教师的冼星海思想的进步与成长。“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到达延安鲁艺，在“鲁艺”音乐系任教（翌年任系主任）”^[9]，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便于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并不局限于在学校环境中，而是要将音乐教学扩展到前线，将音乐传播到前线，让音乐可以鼓励那些前线的有志之士，让音乐成为“锐利的武器”，来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10]。

冼星海准确把握当时时代下的基本国情，对于音乐有了新的定位，同时也是他对于如何充分运用音乐的力量，如何通过音乐教育活动，影响学生，影响社会，激发中华民族斗志这一问题答案的理解。他对于音乐的作用理解最重要的一点，通过带有革命性斗争性的音乐教育，使全国民众理解全面抗战的意义，激发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与革命精神，“使救亡歌咏能普遍地深入内地和前线，深入敌人后方，唤醒大众，认识这次全民抗战的意义。^[11]”冼星海认为要运用音乐的革命性，动员进步音乐工作者与教育家，以具备斗争性、革命性等属性的音乐教育任务为核心，促使他们成为政治领导下的抗日战士。同时培养音乐干部，确保其紧密联系抗战，既提升前后方文化娱乐，也为军队鼓劲、动员群众参军。“我们音乐工作者，要时时刻刻地把握着，我们还在抗

战，还在最艰苦阶段中工作着，不容许我们以音乐作无谓的消遣，我们把握它做一件武器。”这是冼星海对时代下所有爱国主义音乐工作者的教育与启示，也是他音乐教育思想中革命性与斗争性的体现，是他无论是在音乐创作中，还是音乐教学中，都牢记的使命。

（三）马列主义思想引领的教育使命

冼星海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音乐创作中表现出突出的政治性与党派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他表示，我们必须做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2]，这种政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在音乐创作时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政治思想为内容，结合其过人的音乐素养，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过人政治觉悟与艺术造诣。他在《“鲁艺”第三期音乐系一文》，表达了他对于作品中马列主义思想运用以及党的领导的重视：在创作中“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这无疑地是具有它的进步性，革命性，斗争性，教育性，组织性，阶级性，党派性和国际性的要素在里面。”冼星海在鲁艺任教期间，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政治立场和群众基础的音乐作品，是站在代表无产阶级立场，为人民群众创作的音乐。他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马列主义倾向，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审视中国当时的国情，创作了大量歌颂无产阶级群众与革命志士的作品，代表作有《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以及大量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如《保卫大西北》，《牺盟大合唱》及《秋收突击》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冼星海坚决拥护马列主义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与毅力。

在教学活动中，冼星海的教育思想也处处体现出强烈的党派思想以及过人的政治觉悟。以马列主义思想为纲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国音乐事业发展，是冼星海的音乐教育宗旨。他坚信马列主义，在教学中以身作则，使音乐走出课堂，走入农村，走向群众，成为唤醒民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一切学习都先以政治课为基础，尤其是要热心于马列主义，不要嫌它乏味。假如你不弄通马列主义，你的艺术造诣就是有限的。^[13]”他认为同学们需要“把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提高了每个同学的理论水平”，使音乐“在政治领导之下，真正地发挥了它的威力，起了它的伟大作用。”在冼星海远赴苏联期间，仍心系祖国音乐教育事业，撰写了五十个关于音乐思政方面的论文题目，为的是让鲁艺的学生可以进一步把握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为了更要充实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技术起见。^[14]”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题目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音乐是怎样解释的”、“中国新兴音乐的发展根据是什么”、“政治与音乐的关系”等等。这些题目不仅体现了冼星海对音乐与政治关系的深刻思考，也彰显了他以马列主义思想指导音乐教育的坚定信念。

三、音乐教学作品中的坚守与创新

（一）“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结合

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活动中处处透露出坚守与创新的先进理念，在他用于教学的音乐创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他充分分析了音乐创作上新旧形式的关系，并指出：中国所需要的音乐就是“新形式”与“旧形式”科学结合的音乐形式，不仅贴近民族的音乐，同时也结合了西洋作曲技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音乐，是最具有感染力的音乐，“目前中国音乐界对于应用民族形式问题，还没有得到统一确实的结论。有些人主张用西洋音乐形式，有些人主张用旧的民族形式。这两种主张，都是有点偏见。^[15]”冼星海对于个人音乐创作重心具有明确的偏向与把握，对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信，更对民族音乐和中国新兴音乐未来的发展也有极大的信心。

重视“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结合，是冼星海重要的教学思想、创作思想与爱国思想最好的体现。其了解“新形式”，拥有高超的西方作曲技术，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深入钻研民间传统音乐“旧形式”，将其融入交响乐、合唱等大型体裁之中。对于“旧形式”的运用上，他认为要“统一语言文字”，“改良固有古乐，使这些古乐经过现在科学方法的改造，能够应用在乐曲里面，表示着更民族化的音色”，同时倡

导“要发明中国的新和声原则和它的应用，代表看现在新时代的产物，实现新民族的形式”。他对于“新形式”的产生与运用要“参考和研究世界最进步的作曲家国民乐派的作曲家，他们的作曲方法和作风，增进中国民族音乐形式和作风，由量的增加，质的充实，取得与国际的先进音乐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16]”他强调民族性对于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重要性，他在《民歌与新兴音乐》中写道“中国民歌有它的艺术的历史的时代背景，有它特殊的民族色彩。中国是世界上伟大民族之一”，充分体现出冼星海的民族自信心，其发自内心地对于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他希望所有音乐工作者既要研究民族音乐，也要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和技巧，创作新兴的民族音乐，促进民族音乐更好地发展。他坚定地认为，音乐工作者们要更丰富、更有温度、更具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就要对“新”与“旧”的形式的辩证关系有深刻把握，既不能固守陈规、排斥外来技法，也不能全盘西化、割裂传统。

（二）“新内容”与“旧内容”的扬弃

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及音乐创作理念的高度与深度都是立于时代前端的。在音乐教学与创作中，创新并不指全盘西化的创作倾向，而是突出了科学与辩证思想的创新。“冼星海的音乐思想始终建立在如何创作新兴音乐、提高新音乐的质量与水平，并切实运用到课堂与社会的音乐教学中去。^[17]”强调音乐创作的最终目标是创作带有普及性和大众化的音乐，主张将音乐普及到中国的各个角落，使生活成为最好的教材，使音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冼星海音乐创新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创作理念与教学理念上，冼星海提倡运用“新内容”进行创作，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容。“新内容”并不是指照搬西方作曲内容，也不是对传统音乐内容的提炼，而是科学辩证地将新旧内容相结合，总结出适合中国“新音乐”创作的内容。他对于其音乐创作有一套完备的理论支撑，这些创作理念指引着冼星海，无论是在音乐创作还是音乐教学中，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冼星海创作中民族的内容，是指其核心应指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致力于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同时，提升我国国民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民主的音乐创作内容，主要体现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的思想传统，宣扬自由民主的新思想。所谓科学，是指反对主观武断、封建迷信与愚昧无知的观念，同时以科学与真理作为认知与实践的根本指导。所谓大众的，是对少数特权阶层，通过愚弄、压迫多数民众，使百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这种行为的批判。大众的音乐创作内容以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价值，最终实现其先进思想在大众中的普及与传播。

其次，在课堂教学中，冼星海辩证地运用“旧内容”进行音乐创作。“第一种，采取“选曲填词”式的创作方式，利用传统民间音乐曲调填配新词进行创作；第二种，采取“借用、改编”式的创作方式，根据新的思想感情表现的需要，借用和改编民间音调以编出新的音乐作品；第三种，采取“全新创造”式的创作方式，即不囿于某种民间音乐素材，在概括、提炼各种民间音调后进行全新的音乐创作。^[18]”在《创作杂记》中，他对他的大部分音乐创作，都撰写与记录了音乐创作背景、表演时的情感基调、演奏技巧方法等演奏指导，用于对演奏其作品的师生进行指导与教学，如他对于《黄河大合唱》评价道“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冼星海重视其每一个音乐作品，希望每一个音乐作品都可以运用到一定的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的“旧内容”，使其对音乐教学起到正向作用。

四、结论

冼星海的一生就是一本教科书，其短暂的一生也为与音乐相关的各个领域留下了无数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文艺工作者做出了深刻又富有建设性的嘱托：“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19]”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思想，是其个人音乐实践与时代使命深度交融的宝贵财富，其成长历程与创作经历

也塑造了其教学思想的核心内核，即理论结合实践，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以及从实际出发开展音乐教学，并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作为新时代音乐教师，要扎根于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思想指导，将冼星海作为音乐教育的时代榜样，理解与吸收其思想精华，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96.
- [2]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48.
- [3]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5.
- [4]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21.
- [5]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52.
- [6] 黄琛.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育人思想初探[D]. 武汉：武汉音乐学院，2020：1-53.
- [7]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27.
- [8]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104.
- [9] 魏艳. 冼星海在延安鲁艺[J].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18(04).
- [10]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25.
- [11]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85.
- [12]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91：847-879.
- [13]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55.
- [14]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67.
- [15]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48.
- [16] 蒋玉瑛. 《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冼星海全集（第一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49.
- [17] 杨馥蔓. 浅谈冼星海予延安鲁艺音乐系之贡献[J]. 北方音乐, 2015(11).
- [18] 陈宗花. 冼星海大众化、民族化革命音乐形态探索研究[J]. 艺术学界, 2021(01): 336-350.
- [19]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 1.